

中共中央对新区 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①

(1948年12月29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目前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暂时规定如下：

一、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凡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与特务机关所主办的图书出版机关，连同其书籍、资财、印刷所等，一律没收。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兵学书店等，均属此类。但在执行时，仍须作必要的调查，如有民营书店之借用上列牌号者，则应在处理上加以区别。此类书店没收后，原书店即不准再开业。

二、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如开明、世界、北新等书店属之。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也属此类。其中官僚资本应予没收者，须经详细调查确实报告中央，再行处理。

三、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查。如出版教科书者，则劝告他们自行停售党义公民等教科书，及自己修改有关政治的教科书（如历史）。

四、对于新出版的书籍中，如有政治上反动而又发生了重大

影响的书籍，必须干涉及禁止者，暂时采用个别禁止及个别干涉的办法。这些书籍和非由显著的反动派所著作出版，则在采取禁止干涉措施前，应向中央请示。

中 央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发展迅猛，全国胜利在望，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出版领导机构，并于同年12月29日发出（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暂行规定）的指示，对分别处理新解放区不同性质的旧出版机构的政策，作出暂行规定。本通知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胡愈之对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建议^①

(1949年3月)

(一) 书报贩卖事业即书店、书刊出版社及印刷业，此三者应实行分工，总原则应以国营事业处领导地位，民营出版业及印刷业应在党领导之下。

(二) 三联 应改为国营最大书店，控制全国文化商业，在城市、乡村普遍建立分店、分销处，在学校工厂设立书报合作社，但自己不出版任何书刊，政府控制了全国发行事业则进步书刊可大量行销而反动书刊不待命令禁止，自可限制其流行。

(三) 出版社除由国营党营的以外，应按照出版自由原则准许私人自由经营，对人民有害之出版物，只要国营书店不替他推销，自然无法行销。

(四) 印刷业照普通工业办理，大印刷厂由国营，小印刷厂由私营而受国营管理。

(五) 以上办法的好处可使出版自由得到保障，反动书刊受到限制，书刊出版业趋向计划化，书刊成本减低，著作人报酬可以大大提高，书业及出版业干部可统筹分配不至成为无政府状态。

①1949年1月31日，胡愈之到达北平。他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出版工作有些设想，于3月间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谈了想法。周扬于3月17日向中共中央并陆定一部长发出电报，转达了胡愈之的五点建议。

胡愈之对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建议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三联”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这三家于1948年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 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①

(1949年7月18日)

(一) 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

(二) 现在全国解放胜利在即,新华书店进入了城市,同时三联书店已在各城市恢复起来,并已在解放区的若干中等城市中建立了书店,^②此种情况引起了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特作如下总的规定:

甲、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但新华书店是完全公营的书店,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后,该书店即将成为国家书店;三联书店是公私合营的进步书店,将来亦应仍旧保持此种性质,即国家与私人合营的性质。因此在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中(暂时除了台湾以外)新华书店应成为主要负责者,三联书店应成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但在香港,在一个时期内,三联仍是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人。

乙、鉴于在中小城市及农村中,新华与三联两个书店的同时存在,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竞争与浪费干部,因此决定在中小城市

与农村中只设新华书店不设三联书店，其已设者应取消，以后将干部与资金调往城市。

丙、但在大城市中私人书店仍有很大的力量，为了与这些书店进行团结和斗争，执行党和国家的出版事业的政策，三联书店以公私合营的性质，作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而存在是有好处的。因此决定除香港外三联书店应在下列城市中设店，将总店设于北平，这些城市是北平、天津、济南、沈阳、哈尔滨、大连、开封、西安、上海、汉口、长沙、重庆、广州，其他城市如有需要与可能，再行考虑设立。

丁、在上述城市中党的当地最高机关（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宣传部应领导出版部门的党组，党组中必须有新华及三联两个书店中党的负责人参加，以便统一政策并在业务上密切分工合作。

戊、党应经过政府给予三联书店以贷款等必要与可能的帮助，同时三联书店仍应进行向私人募股的工作，以扩大自己的资金，不要一味仰望政府的帮助。

己、保存三联书店在全国的统一组织系统，建立各种必需的企业制度，统一经济和干部的管理，并统一名称，具体办法另由该书店总店通知各分店。

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至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总管理处和北平、天津、上海等13处分店有职工356人。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①

黄洛峰

今天我代表出版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准备分作几方面讲：
一、出版委员会成立经过，二、7个月来的出版工作，三、我们的发行工作，四、干部问题，五、企业化问题。

在未向大家报告前，先简单说几句话：

我们的新华书店，开始是各战略区分别建立的，就因为那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或者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或者是被蒋介石反动军队分割为若干小块，由于当时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先后就在各区建立了新华书店。若干年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地都能完成了任务，对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天来北京开会，就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并布置今后的工作。

在这次会上，出版委员会的工作也应做一番总结，但这个总结还未经出版委员会讨论，稿子是经过几次断续写成的，仅经大家传阅一遍，如果在报告中发生错误或不妥当的地方，主要由我个人负责。

其次出版委员会是一个新机构，我个人一向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工作，关于解放区的一套办法，可以说是刚刚才学习，还是一个小学生，从担负起这工作到现在一直在摸索中，因此感到各方面都不够，都要向大家学习，希望在报告后，各位同志尽量提出

意见，给予指示。

一、出版委员会成立经过

在 1948 年 8 月间，中央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对以后局面开展的估计，就决定建立出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北京解放前，中央宣传部陆续派出出版组的祝志澄、华应申等十几位同志参加北平的接管工作，同时部署出版书籍，供应新解放的城市。

二月中洛峰经东北到北平，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②，首先统一领导平津及华北地区的党的出版工作，并指定黄洛峰、祝志澄、平杰三、王子野、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等为委员（以后又加了徐伯昕同志^③），在中央还没有搬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2月23日，我们就开始在大院胡同五号办公，3月28日迁入司法部街75号，这时中央搬来了，任务也一天一天的加重了。截至最近为要腾给司法部房子，9月21日又迁到东总布胡同10号。

由于干部不够，从开始筹备到现在，始终是在一面执行任务，一面建立机构的过程当中。

3月初，我曾到石家庄去向中央请示，当时中央的指示是：“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7个月来，我们一直就是秉承着这个指示，一步一步的向着统一集中的路上走。

本会的任务，是筹划统一集中的工作，照应了当时的情势：第一步我们立即开始集中出版工作，首先把华北新华书店的出版

工作集中本会掌握。同时决定所出版的书籍，属于文件性的东西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的名义；其他用新华书店的名义。

为了适应具体的工作条件，本会的组织暂时分为出版、厂务两处，秘书、会计两室，处室以下各科的组织，随着工作的展开陆续增设。到目前为止，出版处下设出版、编校、印务（兼代推广）杂志、美术 5 科和资料室；秘书室下设人事、文书、总务 3 科；厂务处尚未正式建立好，只有一个材料科；会计室尚未明确建立分工系统。^④

书籍出版后统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为了统一平、津的发行工作，把平、津原来的东北与华北两个系统的门市部，在 6 月间合并为华北新华书店北平分店和天津分店。

本会成立以来，每周要举行常会一次，一般都能如期召开，到 8 月底止，已开过常会 23 次，谈话会 3 次，讨论决议事项共 200 余件。每次常会，都检查上次决议执行的情形，树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

到 8 月底止，会本部职工为 87 人，直属的北平新华印刷厂职工为 406 人（另按件计酬女工 76 人）。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及 8 个分店、3 个工厂全部职工 918 人，北平新华油墨厂职工共 17 人，以上为本会所直接管理的职工，合计 1 428 人。

出版委员会不仅是进行出版业务的一个企业部门，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的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力量的薄弱，只做到通过业务、通过出版物来发挥它的领导作用，这是大大的不够的。我们对各战略区的新华书店的帮助，对各私营出版业的团结指导工作，是做得太少了，甚至联系都太不够了。有许多应该准备起来或应该马上着手的事情都没有做，这就是没有尽到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本次会上，能够进

行一次很好的检讨 让我们能够在今后把工作进行得更好些。

二、七个月来的出版工作

(一) 统一出版先从统一版本开始

1. 出版工作的一篇总帐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要统一出版工作。那末，我们怎样开步走呢？我们觉得各地的版本是太混乱了，例如《毛泽东选集》，就有好几种版本，每种版本各不相同，由于这种情况，要统一出版，首先而且顶顶重要的，就是统一版本。7个月来的两次出版计划，就是向着这条路走的。

我们的任务重点，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统一版本，也就从这几类东西开始。中宣部的党内教育组和编审组，一直就为重新审订各种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而努力着。

统计从2月到8月底止，我们在平、津两地重排新排的书刊，可以分为12大类，255种（有的是合几册为一种）共305册，其中已出版的209册，完成排校工作打好纸型，交华北联合出版社和华北新华书店付印的26册，正在排版校对装订中的70册。

255种305册书刊（习惯上305册我们总是说305种），除用纸型再版者外，共排20 8415 00字，用掉的纸张是24 665令，已经打出的纸型是783副。总共印装成4 687 983本书。（附表略）

2. “干部必读”的出版

为什么要出“干部必读”呢？因为各地出版的干部读物很多，有些过时了，有些需要重新审订，非得重新整理一套干部读物不可，因此中央决定重新编审一套干部读物，叫做“干部必读”，目前先出第1辑，共12种，出版委员会成立后，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出版“干部必读”。这一套书，现在已出版了11种（还有1种未出），各方面的需要量很大，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纸张缺乏等等原因，已呈供不应求之势。

因为人力不足，这套书的校对工作，还不能令我们满意。尤其《政治经济学》错讹很多，更感到不安，这套书出版后，一般的反映是定价太高。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减低成本。

3. 重排《毛泽东选集》

《毛选》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也可以说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现在109年以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大篇总结。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我们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

《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3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为印好《毛选》，我们又改革了校对制度，树立了新的校对办法。

《毛选》新版，不同于过去的各种版本的，有三个特点：（1）新版是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以时期为经，以文章为纬编选的；（2）《毛选》编委会，在许多需要加以注释的地方，加上了注释；（3）编委会在卷首有一篇编印新版的说明，这篇说明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的。

校阅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我们所最耽心的是恐怕不能很快

的印好装成；更耽心的是由于印刷条件的不够，恐怕在印制上，赶不上东北版。为了这些，当4月24日北平新华印刷厂举行开工典礼的时候，我们就曾号召全厂为印好（毛选）而努力。开始发排的时候，我们也曾动员了整个出版部门的同志们，为迎接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而努力。我们希望在大家的督促鼓励之下，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4. 教科书

在统一版本工作中，又一个重心工作是教科书。

在老区，教科书一向是由各个地区自行编印的，正因为是分区编印，不仅教材不一致，课程标准也不一致。现在，各个解放区早已由分割状态连成一大片，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统一的课程标准，特别是统一的教科书的需要，就更加迫切起来了。

记得去年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曾打电报向中央请示过，今后的教科书是否统一编印？当时中央的回电是：已经决定统一编印，同时并要邀约有经验的人到解放区来进行这一工作。3月间我们到中央去的时候，也曾接触到这个问题，结论还是同从前的一个样。恰巧这时叶圣陶先生他们已经到了烟台，对于编印教科书的计划，就有了可以实行的条件。接着就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经过与他们商量决定华北区的春季教科书，老区完全由华北总店和各区党委分店自行解决，新区如平、津等地基本上用华北新华书店所出的那一套，再辅以旁的分店所出的，这样把上学期勉强应付过去了。至于下学期的呢，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决定或则就各种的版本加以修订或则重新编纂，几个月来，由于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诸位同志的努力总算把本学期的教科书解决了。

教科书的编排工作，截至8月底止，出版了小学教科书7种29册，中学教科书9种16册，还在排印中的中学教科书11种，其中有一部分现在业已出版，最后又发排大学国文1种，师范教

材 4 种。

小学教科书，老区的由华北总店和各区党委区域的新华书店解决。新区，特别是平、津两大城市统由北平供应。总计北平新华书店在保定、邯郸、石家庄三厂共印了 5 305 833 册，北平由出版委员会印出 10 万册，由华北联合出版社印出 1 685 000 册，合计共印了小学教科书 7 090 833 册。联合出版社负责平津两市及附近地区的供应。

中学教科书由华北新华书店在保、石、邯三地印出 343 855 册，由出版委员会在平、津两地印出 600 000 册，由华北联合出版社印出 277 000 册，合计 1 220 855 册。除一部分高初中语文课本和政治课本外，其余全由华北联合出版社发行。

教科书的出版工作，1949 年 1 月至 8 月总共印了小学教科书 83 种（各地所印累计数），计 7 090 833 本。中学教科书 50 种（各地所印累计数），计 1 220 855 本，两项共印制了 8 311 688 本。

本学期的小学教科书，华北一部分地区由当地自行印制老早解决了问题，须由我们供应者，大体上已能及时与充分供应，比起历年的情形，可以说有了某些改进。虽然中学教科书，因时间关系和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力不够的关系，没有能编出全套教科书及时出版，但这学期修订和编出的已近 30 种之多，这是我们应该在此地特别提出报告的，也是我们应该向教科书编委会诸位同志特别致以慰劳的。

（二）出版发行工作的新形式——联合出版社

现在有两个联合出版社，一个是华北联合出版社，一个是上海联合出版社。这两个出版社在全国说起来，是一种出版发行工

作的新形式。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新形式呢？依照中央的政策，我们要实行“公私兼顾”，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想办法团结和领导全国私营出版事业。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联合他们，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呢？我以为如果单靠政治上去团结他们，成立一个出版工作者协会或者每月搞一次座谈会，是不够的；主要还得把他们从经济上结合起来，就是搞联合出版社。

联合出版社的存在与出现，是有一定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一定要基于两利的条件，假使只是一利——我们有利或者只是私营出版业有利都搞不起来的。我们这个联合出版社能够搞起来，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它，同时他们也需要它，就在这样两者都需要的条件下搞起来了。不过我们搞联合出版社还有另外一些目的，例如：在新解放区——北平、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中的私营出版业，过去很多不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些城市解放，他们就陷于一种萧条情况。我们是“门庭若市”，他们则是“门可罗雀”（自然，这种萧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为时甚暂的）；因此，私营出版业的许多人就哇啦哇啦叫起来说：“我们没有饭吃，没有事做怎么办？”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团结他们，领导他们，那么我们就要给他们一个路子走一走，这个路子是什么路子呢？就是让他们有生意可作。这也是搞联合出版社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进入北平以后，在工厂中控制的物资很少，拿到一个厂子，差不多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拿到的纸头不到2000令，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而当时教科书的任务既迫切又沉重，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也需要团结动员他们共同来解决困难。所以我们在北平首先就搞起联合出版社，在上海也搞起来了。关于这两个联合出版社的情形，有许多同志对于这个新形

式，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那么我就对这个问题多罗嗦几句吧。

首先我要报告华北联合出版社（以下简称北联社）。

北联社组织的时候，我们先发动了思想酝酿，记得在五六月间搞过三次座谈会，经过三次座谈会，就把北联社的组织确定下来了，最初以参加第三次座谈会的 15 家，作为基本社员，于 7 月 1 日正式成立。截至 8 月底止参加北联社的股东共为 23 家，其中包括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北新、儿童、广益等 7 家在内（这 7 家共从香港运进纸头 6 900 令投资给北联社）从北联社的资本构成来说，北联社的总认股额是 921 股，每股 500 个北京人民银行折实单位，认股额以 80% 缴白报纸，以 20% 缴现款，共合报纸 9 310 令，现款 92 100 个单位，在总认股额里面，新华、三联投资只占 26.4%，私营书店占 73.6%（其中有少数店家未缴足）

北联社所担负的出版任务在小学教科书方面，主要是供应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和附近几十个县份，以及察哈尔雁北，绥蒙等少数地区。中学课本就供应全华北区的 5 个省份，乃至供应到了陕西省，截至 8 月底止，北联社共印中小学教科书 1 962 000 册。

其次，上海联合出版社（以下简称上联社）成立的时间比北联社更为短促，几乎快到 7 月底才搞起来，这是经过了几场曲折的斗争以后，才算是建立起来的。截至 9 月中旬，已经赶印出 800 万本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解决了华东华中新区的教科书。上联社的资本总额为 1 603 股，每股 500 个折实单位（上海人民银行折实单位）共收股款 756 616 000 元，以纸作价共收白报纸 33 010 令，新华、三联投资 12 000 令，占全部资本总额的 20.75%。

不论华北联合出版社也好，上海联合出版社也好，我们只用

四分之一的力量，运用了人家的四分之三的力量，完全解决了困难。但是这个情形，有的同志还有误解，还说这是：“肥了鸭子瘦了鹅。”不错，从表面上看好像我们有一点损失，因为过去在解放区只是我们独家干，别人不能干，现在进入新解放的大城市，我们不干让别人干了，这不是损失吗？可是我们如从长远的政治利益上看，用一小点经济损失，赚回了一个政治上的胜利，我们不是成功了吗？再说，全中国的出版事业中，我们的力量连印刷、机器、纸头，各种各样的器材都算在内，也不过约占四分之一之强，如果让那四分之三的力量闲起来或者不让它为我们服务，那才真是一个损失哩！现在大家都在喊着没有书看，我们就得把这四分之三的力量动员起来，和我们一道为人民服务。另外从私营出版业来说，他们无事可作，就要倒闭失业，就会造成社会上的混乱，这个包袱什么人来背呢？还是我们自己背，还是各个中央局，各个省政府，各个市政府来背。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闲在那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动员起来。

我们今天检讨起来对于团结运用私人出版业的力量，共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这一工作，做的太多还是太少了呢？同志们，我们做的太少了！我们所做的是否超过了中央给我们的原则呢？还是没有做够呢？很坦白的说，我们没有做够。

今后是不是我们对于教科书的发行就放弃不管了？不控制这个东西了？不是的，我们还要管，还要控制，不论华北也好，上海也好，董事长是我们，经理也是我们，两个头都是我们的人，人家来作陪客跟着跑，别人恐怕会嫌管得太厉害了吧？另外教科书的版权还拿在我们手中，出版的时候，小学教科书，我们要抽2%的租型费，中学教科书抽4%的租型费，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很好地控制着的。

我们应该很快地作出一个总结（华北联合出版社的总结，我

们可以作，上海联合出版社的总结，希望华东的代表回去后赶快作出来），得出经验教训，这对我们团结组织私营出版业会有很多的帮助的。在两个出版社未总结出来以前，我想从组织和领导私营出版业共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这一点来说，是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的。

联合出版社是一种新的形式，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纯公营的东西，也不是纯私营的东西，是一种公私合营的东西，不同于三联那样的一种公私合营的新形式。现在我们还不能估计究竟要 20 年还是 30 年走入社会主义，可是有一点是明确了，就是在我们未进入社会主义之前，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的文化出版事业，要比旁的东西先进入社会主义，也就是首先进入国营。从私营到国营，是不容易跨一大步的，在组织上，思想上都还需要长期做工作，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用公私合营的办法逐渐同他们联合起来，并且还要灌输给他们毛泽东思想，让他们自己内部发生变革（如在上海经过了同志们努力工作的结果，现在有许多私营出版业的内部就在变着了）。我想，用这样的方针和形式去组织他们，将来我们就可能让私人出版业跟着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不只是用这样一种形式，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实验，总结出经验教训，按着这个形式把一向是分散的，一向是“同行是冤家”的那许许多多书店，团结在一道，让它成长，让它发展，让它巩固，一直到和我们一同走入社会主义。我们绝对不能说规定有些人让他走向社会主义，有些人不让他走向社会主义，只要他思想上愿意改造，愿意进入国家化，我们都欢迎。正像昨天陆部长报告中说到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也讲他们要创造消灭自己的条件哩。在今天说来我们还是要发展民族工业，发展以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因而对于私营出版业也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就是要他们发展，叫他们由分散的经营走到初步